

〔美〕迈克尔·H·亨特



意识形态与 美国外交政策



● 世界知识出版社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美〕迈克尔·H·亨特 著
Michael H. Hunt

褚律元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目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美)亨特(Hunt, M. H.)著;
褚律元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书名原文: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SBN 7-5012-1065-9

I. 意… II. ①亨…②褚… III. ①意识形态-影响-外交政
策-美国②外交政策-研究-美国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3113 号

图字: 01—98—2383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Copyright ©1987 by Yale
University**

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米小平

封面设计: 姚少春

责任出版: 尧 阳

责任校对: 雨 遐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9.5 字数: 240000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这本小书讲的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大题目：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它大胆涉足一个充斥着混乱概念的复杂领域。同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经常在严肃的历史与政治文献中交替使用且变化不定的概念一样，意识形态一词很难有固定的含义。因此，一开头我必须申明：通过我自己对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的研究，我确信应该给意识形态下一个广义的、常识性的、可行的定义，这种定义在我看来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认定与假设，可以把某一特定现实的复杂性化解为易被理解的名词，并提出处理那一特定现实的适当办法。

读者对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它与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当然各自都有各种各样的、有时是表述相当明确的观点。我从写书伊始就意识到这个题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读者各种不同的先入之见，将带来种种困难。直到写成此书，我仍然没有丝毫的轻松之感。我十分信服戈登·克雷格十多年前所说的话：“把理念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往往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此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少之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1〕}但是，这个题目太重要了，不容受到忽视，就好像有一个病魔缠身、郁郁寡欢的亲戚，理所应当要求我们给以关注，而我们过去对他的要求给予的满足太少，甚至是敷衍了事。

构筑这幅美国对外关系从发端至今日的广阔图画，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一些片断的史实和诠释——其中有些无疑是读者所熟悉的——组装成新的模式。这一实践的宗旨在于提供一种洞察过去的新的眼光，并启发人们对现实重新思索。希望读者从这一角度来阅读并批判本书。本书无论有多少缺点，希望它至少能唤起读

者认真看待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甚至亲自参与此项研究。

本书第一章谈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它同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要阐述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概念性问题，并提出一个答案，就得越界进入美国外交政策本身这一易生混乱的领域。一旦进入这个领域，读者就应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循序前进。这几章将追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的根源，说明它如何在18世纪与19世纪逐步获得连贯性和号召力，意识形态的诸因素又如何在20世纪初结合成为一个相互增援、威力强大的思想主体，支配着那些与外交政策问题有关的人物的思想。最后两章意在阐明20世纪的美国人直到今日仍在承袭先辈们的观点，其程度超过了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程度。这一观点，一经阐明，便可顺理成章地就这种意识形态对实际政策的一贯影响进行结论性的反思。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论及有关的历史文献。

读者如果知道撰写本书以及它最后成型的初衷，也许能对本书有更好的理解。从某种角度说，写这本书就像在进行一种治疗的实验。作为历史学家，作者对美国人特有的忽视历史的倾向，早已难以容忍，写这本书给了他宣泄这种情绪的机会。我们的对外政策基本思想的显著的连续性没有受到充分认识。即使是公众中最熟悉政策的那部分人，也认为我们面临的国际问题是史无前例的，并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在他们看来，对当前外交问题的理解，以及设计出适当解决办法都同过去无关。关于过去的外交政策，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领导人已把早期的自我限制的过时原则扔在一边，而采取了与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更相适应的成熟的实用主义。从这种流行的概念出发，就无法想象从前的思想方法会促进（而不是阻碍）我们的国际地位的转变，并且在完成转变很久之后，这种方法对于决策者的思想来说仍然很重要，甚至成为一种最基本的思想方法。

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学者们往往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现实问题上而忽视了文化价值的作用，这样，他们不知不觉间成了延

续这种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神话的同谋。学者们日益专注于20世纪风云(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与一场冷战)的研究,也就支持并加强了那种把当代政策与过去的外交经验割裂开来的流行观点。为了解释美国取得所谓的新地位的原由,历史学家在那些研究方向狭窄的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于下列的问题,如:战略思想的变化,经济体系的需要,精英利益及其影响,总统的作用,官僚政治的运作,以及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互动。现在,应该是意识形态——广泛的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受到应有重视的时候了。

撰写本书使我得以阐述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最初出现在我研究美中关系的著作中,但受范围所限难以进一步发挥。在研究美中关系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所谓国家使命感、对“东方人”的成见,以及对一种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于构成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所谓“门户开放”的观念,“既来自美国人的赎罪与自治的梦想,反过来又助长了这些梦想”。^{〔2〕}写到这里,我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对更大范围内的政策思想尚未适当地探究,因此无法给以充分解释。我逐渐认识到:建筑起一个总的思想构架的想法还是值得一试的。

最后,写这本书使我得以把近十年来的研究心得写到纸上,这些心得是我从耶鲁大学、科尔盖特大学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们的质疑中获得的。这些学生,同大多数对外交政策有兴趣的美国人一样,对于世界各地对美国的关注焦点及美国的资源所提出的要求,感到既兴奋又困惑,他们渴望了解美国是怎样应付这些要求的,但是,他们却不能静下来好好看一看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如何影响着我们对这些要求的理解,并如何作出回应。我试着向学生们提供某种解释,这对我自己也是真正的教育。

这部书述及的问题广泛,论点也往往是独辟蹊径的,因此很有必要也特别需要他人的帮助、宽容与鼓励。想把这个题目写成一本

书的念头一进入我的头脑，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查尔斯·格伦希就给予热心的支持。此后，许多朋友与同事给我种种帮助。我感谢罗伯特·拜斯纳，多萝西·博格，约翰·库根，威廉·多尔比，詹姆斯·费策尔，哈里·哈丁，托马斯·希泰拉，唐·希金博特姆，史蒂文·莱文，唐纳德·马修斯，利昂娜·西蒙与埃利斯·西蒙，以及玛里琳·杨，他们在我写书期间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与批评。我还要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琳达·卡尔与沃伦·诺德，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洛尔·格卢克，普林斯顿大学的阿瑟·沃尔德隆，是他们提供了机会，让我在他们那里试讲我的某些观点。最后，我要感谢玛丽·伍德尔始终耐心地替我誊清稿件，提供了无价的帮助；感谢琳达·史蒂文森，劳拉·爱德华兹与约翰·比姆在成书最后阶段的帮助；感谢奥托·博尔曼在编辑方面的杰出指导。我希望所有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有过贡献的人士，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些新的、有说服力的、或至少是能引起思考的东西，感到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我还要对许多学者表示感谢，我曾摘引他们的著作。鉴于这里不可能一一注明，我只有让本书的注解与历史文献目录作为部分的、不够充分的感谢方式。其中一种必须在此提及，即已故的阿瑟·赖特有关中国佛教的一本书。赖特的著作言简意赅，表现出广博的学识和优雅的文风，几年前曾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在本书动笔时，它立即作为写作范例映入我的脑际。教师们播下的种子如今已结出喜人的果实。

从某些角度来说，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全家合作的成果。葆拉·亨特的敏锐判断一再促使我将某些论点阐述得更加清楚。几个女儿有时替我校稿。她们自己从未意识到，她们本人就是对我的提醒，使我想到对于她们所继承的这个世界应尽的义务，因此也可以说，本书是奉献给她们的。如果我的努力使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的观点有更多的自觉，在运用权力的时候较谨慎一些、较聪明一些，那么，我就部分地完成这项义务了。

目 录

前 言	3
一 正确理解意识形态	1
二 对国家强大的不同看法	21
三 种族等级观念	51
四 革命的危险	96
五 20 世纪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	131
六 当前的两难困境	184
关于历史文献	216
注 释	237
索 引	282

一 正确理解意识形态

只要我们在朝前看的时候朝后看一看，就能够把表面现象同真实情况，把暂时的因素同永久的因素，把插曲同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很好地区别开来。何以如此？也没有什么大的奥秘，……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总要遇到重复出现的老问题，而回应的办法也或多或少都是以前习惯的做法。

——沃尔特·李普曼（1943年）

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念，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

——亨利·基辛格（1979年）

过去十年或更长时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闹得沸沸扬扬。无休止的越南冲突使美国人深感不安，特别是那些从年龄来说，政治意识的成熟同战争高潮同时来到的一代人。越南战争使慕尼黑与珍珠港所孕育的冷战规则的束缚有所松动，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上一代人对圣战的信仰。70年代早期，一位观察家宣称，“年轻的美国”如今想在外交政策上“冷静下来”；另一位则在几年后宣称已出现了“世代交替的范例”。^[1]尽管里根政府企图以重新抬出典型的冷战模式来结束外交政策的争论，但学术界、新闻界、政界、军界仍在继续辩论越南战争的教训及其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影响。

对越南战争与里根政府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比例大大上升。许多批评者都是有过实际外交工作经验的外交政策分析家，

他们的兴趣多种多样，包括：战略策划、国际经济、决策过程，以及所谓“第三世界”。他们的工作合在一起，对于那种基于虚妄的假设、倾向于盲动、代价惨重的政策构成了准确的、有时是摧毁性的打击。批评者告诉我们，近几十年来，世界已有很大变化，冷战政策已经不再适用。有些人坚信，甚至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领导人对世界也有许多误解，这极不利于他们自己的人民以及他们想去影响其命运的别国人民。批评者已形成一个群体，他们认为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已是当务之急，而要使这种改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必须对制定政策的前提进行根本性的、彻底的反思。

任何人听到这些批评都不会怀疑，从冷战早期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如今已大成问题。过去曾经帮助制定政策的人现在也在大事宣扬这些政策的过火之处与不足。理查德·巴尼特曾把这些政策形容为：冷战勇士为抵制革命的爱国主义所进行的一贯的、主动的、最终事与愿违的敌对行动。^[2]梅尔文·格托夫与理查德·范伯格进一步发展了巴尼特的论断，罗伯特·帕肯厄姆又予以补充，他阐述了美国政府50年代与60年代以种族中心论的态度对待发展问题的一系列失败做法。^[3]厄尔·拉夫纳尔与戴维·卡里奥则揭示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可悲倾向——他们总是超出可论证的美国利益与现有的美国资源去承担海外义务。^[4]拉夫纳尔呼吁采取一种更为节制的美国外交政策，他的说法似可被看作是对批评派的论点的总结。

在一个可塑性不再那么大的世界上，我们必须重新树立外交政策作用有限这样的意识。不应把外交政策看作是矛，而应看作是盾。外交政策不是宣传我们价值观的工具或表现我们的妄想的托词，而是保存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内制度的最低条件。……我们首要的事情是运作我们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实践和加强我们的经济活动，并修补和完善我们的社会。^[5]

如果说这类呼吁实行更多的克制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缺陷的话，那就是对意识形态近年来在政策中的地位注意不够。他们承认，美国领导人陷在意识形态的罗网中，其结果是支持了错误的政策。但是，他们没有系统地思考那种意识形态的涵盖范围、支撑它并促使它拒绝改变的根源、以及它同政策的准确关系。批评派难以从概念上把握这一系列问题，说明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纠缠之中。

在近年来洞察力较强的评论家中，有两位说明了这个问题。^{〔6〕}拉夫纳尔呼吁改变“我们基本的战略‘类型’——我们的决策系统孕育出来的认识事物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他认识到，要改革政策，必须对这样一种假设直接提出异议，即“凡美国正当地关心的现实问题，都有普遍意义”。改革还须打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与一支力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神话，当然，这样也许会使人感到“痛苦”。拉夫纳尔顺便地但颇有见识地指出，这类神话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掩盖国内的分歧而把社会捆成一个整体”。再者，美国人“习惯于听人家讲美国人的特点在于他们对世界秩序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如果转向谨慎、克制的政策，他们便会感到自己降低了身份。他们也许不希望“被告知他们应当放弃神气十足的抱负而像其他国家那样过平常的生活”。^{〔7〕}

同拉夫纳尔一样，范伯格也紧紧抓住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同国民主气的联系。他认为，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健康力量激发文化自豪感和凝聚力，并增强民主价值观。但是，他又指出，对于一个大国，民族主义也“有它黑暗的、危险的一面”，会释放出“骄傲自大与恣意妄为的洪水，泛滥成为僵硬严峻、沙文主义的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将发现他们面对着难以驾驭的“感情冲动的公众，他们吵吵嚷嚷，要把他们的自我意识推广到全世界”。范伯格似乎把意识形态譬喻为烈性酒——少喝几口无害，多喝了就有危险——力劝我们把“意识形态热情”置于控制之下。“美国政府

被意识形态蒙蔽了自己对各种事物和对外国政府的洞察力,这样既无必要,其效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我们必须放弃那些浮夸的观念,认为我们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相反,我们应当“学会满足于我们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而不应认为别人必须仿效”。范伯格总结说,塑造出这种“新的自我认同”,是“我们最困难的任务”。^{〔8〕}

批评派认识到了美国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的自我伸张的(assertive)外交政策^①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紧密联系。他们未能更加充分地把握意识形态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满脑子当代外交问题,同他们对之讲话的公众一样,缺乏历史的透视,因此跛足难行。尽管说可以理解,然而,外交政策批评者的这一缺陷是严重的,因为他们小看了在探索新政策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假设意识形态对于制定政策来说占据着核心地位,不是偶然起作用的,那么,难道真有可能把二者隔离或分离开来吗?再假设,外交政策的某些核心观念是同国内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安排紧密相关的,是受它们支持的,那么,那些观念能根除吗?与一项自我克制的政策相适应的新的灵感源泉与指导思想能找到思想基础吗?最后,再假设,对那些观念的攻击证明是正当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并触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漫骂式的辩论,那么,这样的后果有多大的危险?我们的处境能比今天更好些吗?

这些假设与提出的问题不能使鼓吹改变政策的人欢欣鼓舞,但是弄清楚以下这个问题总是明智的(且不说老老实实在地治学也需要这样做):即批评派的攻击的目标究竟是不堪一击的帐篷城市,还是巨大的城堡?他们的对手究竟是一伙蹒跚而行、垂头丧气的人呢?还是决心捍卫老信念、并且受到大众支持的难对付的强手?尽管这种战斗情绪开头也许因为抑制了新生力量的热情而显得不识相,但要获得战役的胜利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今后的斗

① “assertive”一词在本书中屡次提及,包括自以为是、自信自大的意思,现据某学者的译法,沿用“自我伸张”这一有创意性的词汇。——译者

争，或是一场不可抗拒的冲刺，或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攻坚战，如果批评派不肯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不仅会减少成功的希望，而且只要头一次试冲达不到目的，便将在队伍中惹起困惑、灰心甚至失败主义的情绪。

大量证据证明，这不是一个虚设的前景。批评派的第一次袭击已经无功而返。近来的政策制定者已被证明出乎意料地难以触动，他们还在歌颂冷战精神，拒不承认在越南承担义务是一项根本性的大错。新保守主义分子还在鼓吹美国应不惜任何代价在世界各地捍卫自由。选民们似乎喜欢听到嘹亮的号角声：召唤国民将疑虑置于一旁，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世界领导人的角色；他们甚至比政策制定者更加不愿意受到一项谨慎、克制的政策的束缚，其实这样的政策对于一个情况复杂、政见分歧的世界来说是比较适当的。尽管许多美国人承认近年来冷战政策代价过高，有时也并不奏效，但他们仍不愿接受这种政策的前提本来就是有缺陷的批评。

* * *

显然，忽略了意识形态，想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就可能遗漏关键性的一步。满脑子当前政策的评论家对此问题只是扫了一眼，但未深究。致力于从长远观点研究美国政策的历史学家是否做得稍好一些呢？回答是一个肯定的“是”。事实上，只要试图对美国如何进入国际政治的密林，或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意识形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对近三十五年来历史进行诠释，有两个重要派别（对此分类也有不同意见）：一派与乔治·凯南相联系，另一派与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相联系。在这两派观点中，意识形态肯定都占据中心地位。

然而，这两种有价值的、思虑周到的看法，在处理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时都无助于评论界摆脱混乱的概念纠缠，也没有提供我们所期盼的研究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的新的洞察力。看来，历史学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纠缠——凯南困扰于一种肤浅的、甚至是苍白无力的概念，威廉斯则受困于狭窄的、有时是机械的概念。不

过，他们的著作还是值得我们去翻一翻，因为它们可能有助于推动我们以一种十分需要的新视角去透视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

乔治·凯南被公认为某一派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带头人，这里，意识形态应冠以“贬义的”三字。他在这方面的经典表述，出现在他刚结束20年的公务生涯之际；他最终以“遏制理论之父”闻名于世。1950年，他在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工作期间，应邀在芝加哥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这使他几乎立即便得到了一个机会，把自己的经验整理出来，用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研究。这一系列演讲是凯南作为历史学家的起步之作，极为成功。一本薄薄的《美国外交1900~1950》^[9]成为“冷战”一代的圣经。该书重印多次，至今仍受到广泛的阅读与尊重，它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了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这本书的问题在于用不适当的、错误的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来界定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关于道德主义，凯南意指献身于美德却缺乏必要的力量与意志来维护它的做法。道德主义介入政策制定，或是直接的——通过政策制定者本身的态度；或是间接的——通过公众舆论的压力，而这种舆论是由喜爱喧嚷的少数民族、群众性的歇斯底里、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和装腔作势者造成的。妨碍制定健全政策的另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是法治主义，这反映在把国内有关维护和平、调整和契约关系的概念套用到并不适用的国际事务中去。它也可以通过政策制定者的观念直接反映出来，因为他们本身往往就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或者间接地通过由律师所统治、并围绕着制定与解释法律而组织起来的政治体制反映出来。

凯南指责这种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的理念曾一再阻碍了对国家利益的明确界定与有效追求。为阐明他的看法，他首先举出了麦金莱政府作为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他抱怨麦金莱政府进行“美西战争”完全是出于“主观的、感情的原

因”，虽然获得了殖民地，但名声并不好。他批评海约翰 1899 年～1900 年所维护的“意向崇高的、理想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种公开做姿态的典型例子。凯南认为，这一政策建立在对中国的情感眷恋的可悲基础上，显示出对东亚的战略现实的无知，最终导致了不该发生的对日战争。凯南认为，这一政策建立在对中国的情感眷恋的可悲基础上，显示出对东亚的战略现实的无知，最终导致了不该发生的对日战争。凯南认为，还可以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说明义愤填膺的公众会加入到一场讨伐世间罪恶的十字军战争中去，然后又因他们的情感能量在难以对付的现实势力面前消耗殆尽而陷于幻灭。美国一再成为幻想的俘虏：要么把战争看作是可以带来全面胜利的政策工具；要么认为可以通过全球裁减军备、仲裁条约、宣告战争非法、国际组织的行动以及其他绕过“国际事务真正实质”的方法去取得和平。^{〔10〕}

在 20 世纪之初还自认为是“一个中立小国”的美国，要迎接凯南写书时心目中的苏联的挑战，就必须找到新的政策基础。政策制定者要改进其工作表现需要采用更理性、更深思熟虑的国际政治观点。答案应从“现实主义”中去找。“现实主义”一词在凯南的文集中到处可见，后来成为大学本科生、安乐椅中的战略家以及真正的政策制定者都喜爱使用的“口头禅”。这个词精确地表明了凯南的历史分析所揭示出的美国的需要：以恰当地界定国家目标为基础，更加有序地、清醒地制定政策，有力地把握住国家形势，从而动员起足够的力量去克服预料中的障碍，实现期望的目标。美国的政策目标总是出自“基本上正派”的源头。如果行之有效，也许还能推进“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11〕}

凯南及其他“现实主义”对于意识形态对政策的影响怀着深刻的厌恶，而把自己想象成“实用主义者”。他们大声疾呼，指出用各种“主义”来看世界的危险。意识形态使人眼花，使人盲目，还以崇高事业的名义为极端非人道与肆意毁灭的行为辩护。凯南及其同时代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所目睹过的恐怖——苏联的野

蛮情况，使大半个世界卷入其中的一场战争，以及吞没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的大屠杀——看来正是意识形态狂热的苦果。他们曾为消灭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而作战，但他们尽管获得了胜利，地球仍笼罩在意识形态之中，形式上变成了苏维埃与中国共产主义。凯南厌恶意识形态的思想形成于更早的时期，即他于20年代与30年代在中欧与苏联任初级外交官时期。他从这些职务退下来时，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认为马克思主义歪曲了世界的面貌，倡导布尔什维主义的人都是些能做出“许许多多残忍暴行”的精神病患者。^{〔12〕}

凯南显然不愿意说明，美国对世界的看法也被意识形态的影响扭曲了。他从未明确指出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本身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或是某个更大的意识形态系统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人会犯错误，也许他们幼稚、自相矛盾或容易受骗，但他们决不热衷于意识形态。他争辩说，他所说的“主义”，应被理解为“那些大喊大叫的少数派：政客、时事评论员以及各种各样想出风头的人”，从自私的目的出发用来操纵公众的工具。这样，他实际上已把批评从可以明确指认的、强有力的、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转移开去，指向一种鼓励政策制定者及其他人公开作姿态的定义模糊的民主精神。正如他在《美国外交》一书中所说的，世纪之交的美国政治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一个强国去处理对外事务”，而此种状况迄未改变。^{〔13〕}

凯南的解决办法是使外交政策同民主进程绝缘，从而尽量缩小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影响。人民只应在偶然的公民投票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意见。日常的政策应当保留为专家的特权，这些专家既熟悉国际事务、忠诚于祖国利益，又不随着公众情绪和“受纵容的过度行为”以及统治美国政治的集团利益而摇摆不定。作为亲近的、可信赖的顾问，那些专家终将把一项“与一个大国相称的成熟有效的外交政策”交于当选的国家领导人的手中。^{〔14〕}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一书中被如此一笔带过，也许可以

看作是出自一位前冷战官员沾沾自喜的白日梦。凯南及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者具有一个深刻的信念，认为在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中围坐在委员会圆桌四周的是一群超然的、冷静的分析专家，他们可以通过集体智慧把握住国际事务的“现实”。凯南在他的《回忆录》中争辩说，只有“眼光高于一般群众、果断、冷酷的少数人”才能为“一个茫然无所适从的孩子”提供所需的指导。^{〔15〕}

这种诱人的、精英论的观点，在《美国外交》一书中成为中心思想，其所根据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它假定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都是肤浅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种更为宽广、深入的文化的价值观与需要的表现。它假定那些专家们都是没有思想包袱（或至少包袱很轻）的超人，基本上不受种族优越感、民族偏见或文化成见的污染，而且经过思考后在基本原则彼此间能大体上意见一致。最后，它还假定，专家们和他们为之提供咨询的政策制定者们可以在美国政治体制内部操作而无需屈从于该体制的基本要求。他们也许多多少少能创立并支撑住一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政策，名义上是美国的政策，实质上不代表美国人的基本愿望。把这些假定归并到一起，便出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对意识形态进行口诛笔伐的乔治·凯南，却把现实主义作为他的意识形态，并且，为了调和矛盾，更不遗余力地想劝导别人也这样做。

凯南对外交政策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说明他没有能力把当前的外交政策批评者带出他们如今已深陷其中的辩论困境。他们和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要去理解意识形态，而不是表面上谴责并抹掉意识形态的某一种表现形式，而暗地里又接受另一种表现形式。一位有眼光的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而他针对的似乎就是凯南：“在讨论某种社会政治思想时，从一开始就用命名这些思想的词语来判定它，认为它是畸形的，或比这更坏，这种讨论只不过是先验的强词夺理。”^{〔16〕}

《美国外交的悲剧》显然是另一本可以与《美国外交》相提并论的著作。这是一部从经济利益角度对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作历史